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福特基金会资助
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07
潘绥铭 主编

第 ① 辑 Volume 1

中国性研究

Sexuality Research in China

主编：黄盈盈 潘绥铭

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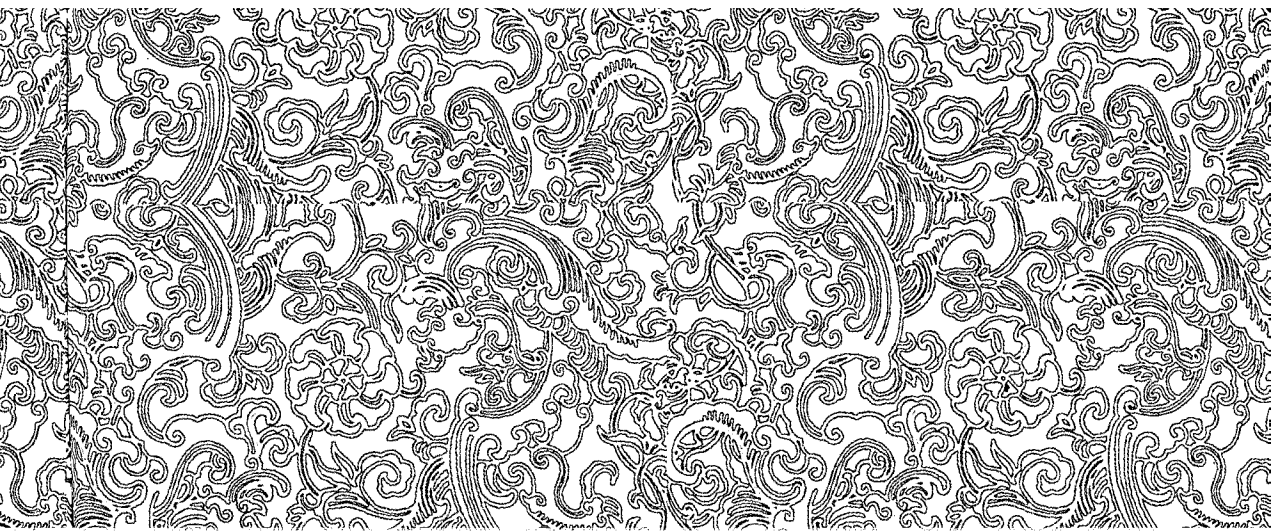
阮芳赋主编 性学万有文库(030)
高雄 万有出版社 台湾
2007年5月

主编：黄盈盈 潘绥铭

中国“性”研究

第1辑

Sexuality Research in China
Volume 1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福特基金赞助

潘绥铭 主编

中国 sexuality 研究系列 07

书名：中国“性”研究第一辑

主编：黄盈盈 潘绥铭

UP

出版者：阮芳赋主编：性学万有文库 030

万有出版社

ISBN-13: 978-986-83350-0-4

地址：高雄市三民区民礼路40号

TEL: (07) 385-4553

FAX: (07) 615-8001

E-MAIL: universalpress88@yahoo.com.tw

邮拨账号：42199922

户名：万有出版社

名誉社长：林燕卿

社长：张隆基

发行人：萧金柱

初版：2007年5月



目 录

■ 代序:

性,是本能的吗?	潘绥铭	 1
----------	-----	---------

■ 方法 • 视角

性学,还是性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区别	潘绥铭	 7
发展“性”研究的“主体构建”思想	黄盈盈 潘绥铭	... 10

■ 论文 • 评议

倾听“出柜”故事:话语冲突和社会变迁	魏伟	 14
性教育文本对青少年和性的建构	王文卿	 32
性,看与被看之间	杨春宇	 79
传媒与男性研究	张京	 90
当代文化变迁对法律的冲击——以性为视角	张卓	 105
当鱼爱上象,或反之亦然:以《今年夏天》为例, 漫谈大陆女同电影的情欲表达	杨洁	 113

■ 综述 • 分析

身体·性	黄盈盈	 124
------	-----	-----------

■ 调查 • 报告

男客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黄盈盈 潘绥铭 刘忠一 王洁	... 162
------------	----------------	---------

■ 手记 • 随想

流动的阴阳	张园	 186
“男孩站着,女孩蹲着”	张静	 189





性，是本能的吗？

□ / 潘绥铭^①

我在做一门可能很奇怪的学问：性社会学。多年来，人们一听，大都保持礼貌的沉默，没什么人来刨根问底。可我却已经在重点大学里讲了12年这门课了。学生也是“人们”，所以我总是到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才能听到他们提问：它是什么？还有一个潜提问，只有两个学生说出来过：它有什么用？

它是什么？就是100多年来，人们不再把“性”仅仅看作生理现象和“床上事”的历史。它有什么用？这段历史，就是它的目标和结果。

性社会学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人类的所有性行为，无论多么奇特和罕见，与人类的其它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跟吃喝拉撒睡一样，而且跟每天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一样。它们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原因并不是“生物本能”（而且也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是人所处的社会使然。因此，那些可以用来解释其它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性行为。

这个命题有两层含义：1、人类的性行为是经过社会化的；2、人类的性行为主要是人际的，是交往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单独性行为。即使在自己偷偷自慰这样的性行为里，表面上看来不是人际的，也没有两个真实的人在交往；但是由于自慰行为也是经过社会化的，在自慰者的背后，实际上矗立着整个社会，因此一个人在自慰时候，实际上也是在与社会进行着交往，也是处于一种人际关系之中。否则，为什么有许多年轻人，一方面在自慰中获得快乐，另一方面又因此而烦恼不堪？就是因为他们躲不开社会之网，烦恼于对烦恼的烦恼，受害于对受害的恐惧。

^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性社会学研究所。

在性社会学的发展史上，金西（美国教授）以前的所有研究者（包括弗洛伊德和蔼理士^①）的根本贡献（1885 - 1947），只不过是揭示和罗列了社会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性现象。这里面所潜含着的命题是：实验室里的、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性行为，与社会中实际上存在着的性行为，是不一样的。

金西的调查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②，1947和《人类女性性行为》^③，1953），最大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是运用统计数字来揭示现状，而是在传统的生物学因素之外，发现和总结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对于人类的性发育和性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就是“性的社会化”这个命题与基本概念的初始。

到了1972年，盖格农（美国教授）的《性举止——性的社会组织》^④一书，基本上完成了“性的社会化”的理论的构建。他说：我们那些所谓的“性本能”，其实只是“原稿”；只有经过社会大彩笔的描画，才显现出成年后的五彩缤纷（或者叫做五花八门）。

到了1994年，劳曼等4位美国教授的《性存在的社会组织》^⑤一书（俗称“芝加哥报告”，因为是社会学的鼻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基本上构建起了“性行为是人际和社会的”理论构架。

此书的重点，是用调查数据描绘出一幅“性行为的社会网络”的示意图。你会发现：如果你曾经跟一个以上的人做过爱，不论是外遇还是再婚，不论是跟同性还是异性；如果其中的一个对方也是这样；那么你实际上就跟许许多多的人在客观上“搭界”了，可能是“串联”，也可能是“并联”。不仅性病和艾滋病可以在这个网络中传播，而且人们的性行为中那些最无法言传的事情，例如采用什么姿势、获得什么感觉等等，也都“上网”而且传播了。结果，你不仅仅是被自己的成长环境给社会化了，而且也被那个你并不知道的“网”给多多少少地“化”了。

看明白这幅图，80%左右的美国成年男女的性行为，哪怕早已改邪归正，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了，更不敢乱用“随心所欲”、“独立”、“自由”这样的词了。

① 《性心理学》，蔼理士著，潘光旦译注，三联书店，1988年5月。

② 《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金西等人著，潘绥铭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另有中译本《男性性行为》，黄晶忠译，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

③ 《人类女性性行为》，金西等人著，潘绥铭译，团结出版社，1990年3月。

④ 中译本：《性社会学——人类性行为》，盖格农著，李银河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

⑤ 此书的通俗读本本《美国人的性生活》（Sex in American），迈克尔等人著，潘绥铭等人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此书的学术读本，尚未译成中文。

至此，性社会学终于可以说是自立了。因此，毫不奇怪，尽管盖格农并没有参加多少实际调查，也并不是社会调查的大家，但是他的名字仍然排在作者的第二位。

至此，“性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的命题，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就使得社会学的所有其它理论与研究成果，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运用到性行为研究来了。（尽管现在这样做的人还不是很多。）

至此，生物学与社会学在性这个领域中的斗争，基本上打了个平手，开始呈现为势均力敌的局面。

但是，生物学显然还牢牢地占据着性的生理现象与性（的生理）反应这块广阔的阵地，而且似乎已经扎根了。性生物学的最伟大进展，发生在1966年。当时，马斯特斯与约翰逊通过实验室观察，创立了人类性反应周期的基本理论和“性方面的行为疗法”的应用理论。^①他们的具体成果很多，可是人们最容易在日常生活里验证的则是：男人在性高潮（射精）之后，必然有一个“不应期”，就是不再对外界刺激做出性反应的时期。女人却没有这个不应期，所以女性不但客观上可以连续多次达到性高潮，而且达到性高潮的能力近乎是无限的。这似乎在说：人归根结底还是生物，生物性仍然是制约人类性行为的最主要因素。

随后，1972年，卡普兰创立了“新的性的行为疗法”。再往后，许多生物学家开始探索和总结人体内客观存在的“性系统”，而且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例如“脑电波性高潮”理论就认为，性系统实际上独立于我们以前所说的“生殖系统”。它是以皮肤为感受器官，以神经为传输器官，以大脑皮层的某些“兴奋灶”为控制协调器官，而传统上所说的“生殖器”，其实只是“性器官”中的一种，只是“反应器官”而已。^②

时至今年，从天上给性生物学掉下一个大馅饼来。可惜知者不多，且细细道来。

当全世界被“克隆”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不过我总是怀疑，至少在中国，这恐怕与传媒的“炒作”有很大关系），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些电脑制造商的豪言壮语。他们宣称：现在已经可以用电脑创造出一个视觉上和听觉上的性的“虚

① 《人类性反应》，马斯特斯等人著，马晓年等人译，知识出版社，1989年5月。

② 有关著作均尚未翻译。可参见《现代性医学》，薛兆英等人主编，人民军医出版社，1995年1月。

拟现实”，就是利用多媒体技术，不仅使人看到和听到栩栩如生的性生活场面，而且可以由观听者自己来指挥屏幕上的“性演员”，你让她/他怎样，她/他就会怎样，即所谓“互动表演”（interactive show）。这会使人一如身临其境。如果再给人穿上特制的紧身衣，通过它，使电流适当地刺激到人体表面的大约 100 万个感觉神经的神经元；那么，人就会产生相应的触觉。在这样一个虚拟现实里，人不仅会如入其境，而且会更加美不胜收。这是因为，多媒体表演以及电流的适当刺激，在强度上、可调节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远远超过真人。

尤其是，如果把天下的性感明星们都制成虚拟现实的软件；那么随便什么人，只要花钱买来这种软件，就可以与那个明星在虚拟现实里寻欢作乐，而且其美好程度，会远远超过真的与那个明星做爱。

电脑大亨宣称：这一切，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也越来越可行，很快就有可能以此暴富横发了。

那时，人类还需要婚姻吗？还需要真人之间的性生活吗？天啊，对于希望保持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这难道不比“克隆人”更具有现实的威胁吗？

从学术上说，如果此事成真，性生物学就将反攻成功，甚至把性社会学一笔勾销。因为按照电脑大亨的说法，甭管你白人黑人穷人富人男人女人，只要你进入虚拟现实，你就会见异思迁、忘恩负义，来上一段“镜中缘”；还会飘飘欲仙、如醉如痴，胜过“人间烟火”。什么社会教化，什么忠贞情爱，统统都会烟消云散。

其实，在性社会学看来，即使此事成真，且不论有多少人会用它来取代真实的性生活，就是仅仅在生理上，也只会有一部分人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是因为，人类对于外界的性刺激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甚至于可以说，人类的哪些部位对于外界的性刺激更敏感，也是被社会化过的。

举些尽人皆知的例子：有的男人一有外遇就阳痿；可另一些男人却是只跟老婆才阳痿。过去的一些女人，奶过 10 个孩子，也没发现自己的乳头跟性有什么关系；可现在的一些女性，青春期刚到就会自己摩擦乳头以便获得性高潮（女性自慰的一种，在北京市有过自慰的女大学生里达到三分之二弱）。这些，能说是生理的必然吗？

归根结底，那些一直被认为是生理本能的现象，那些被生理学甚至解剖学反复证明过的“性器官”，其实也是社会存在的产物，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社

会行为。

这个命题，从学术上来说，石破天惊的意义并不亚于“虚拟现实”给人类实际性生活所造成的冲击。它已经是性社会学在向生物学“侵略”了，将使得人类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的肉体，不得不更深刻地质疑（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将是比波普的“科学哲学”更大的一个进步。

当然，现在这还是一种虚拟。可是，在全世界已经拥有数百名研究者的性社会学，下一步的目标，不也正在于此吗？如果获得突破，它的根本价值，还会有多少人怀疑呢？

如果扯到半题外半题内的话头上来，那么我们现在在讨论一切有关“性文学”和“性描写”的问题时，是不是应该首先了解一下性社会学的大致历史与前景呢？

我们在判断一个作品、一段文字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仅看它的细节程度，不应该仅仅看它美不美、自然不自然；也需要看看，它是把性行为描写成纯粹生物现象，还是描写成社会行为。

这是因为，如果是前者，我认为还不如去读性生理学的实验报告或者性行为学的调查报告，例如《海特性学报告》^①，那里的细节描写更多、更细。这样的文学恐怕是钻了“无性可看”的空子，或者是趁了人们不知道还有性学报告之机。这显然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而且，不管它“黄”不“黄”，注定是长不了的。

反之，如果把性行为按照社会行为来描写，那么细节再多，也仍然是在文学的范围与功能之内的，仍然是文学与学术之间最主要的相通之处。对于这样的文学的非难，其实仅仅是一个可以给什么样的人看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不够文学”的地方。

所以，我这个文学的门外汉实在不明白，在某些小说里，男男女女个个都是“十八般武艺俱全”，甚至不得不用空格来描写；可是他们的性行为（甚至很罕见的性行为），却都没有背景与环境，没有发展过程，没有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甚至连性别差异都没有，好象人人天生就会，天生就喜欢；而且横看竖看

^① 《海特性学报告》，（美）海特著，张月等人译，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类似的还有《女人的见证 - 美国十万妇女性生活的调查报告》，（美）黛夫利丝等著，李洁译，海潮出版社，1989年1月。

都看不出前因后果。这，也叫文学吗？

可别跟《金瓶梅》比。在《金瓶梅》的纯粹性行为描写中，你能看出西门庆到底真爱谁，能看出数个女人之间的争夺，能看出所有性行为方式的原因和局限，能明白为什么偏偏要用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的名字来作书名，而不用别人的名字（例如，《西门庆风流记》多好）。

我倒是明白文学之外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仅仅用“黄”来指责它，却不用文学的本义。可惜，不能说了。

能说的是：性社会学也好，性文学也好，总要有一个深刻和长远的价值，才会逐渐有人认你的帐。性社会学以前被看低，与现在性文学（甚至整个文学）被看低，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从业人员们没有去发掘自己的饭碗对于别人的意义，弄成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结果当然是“曲低和寡”。

我相信，1980年代以来性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判定标准。我们在议论一切与性有关的现象时，不再仅仅依据伦理的标准和爱情的标准，还要看看性学是怎么说的。今后，性方面可能会更加多姿多彩（或者叫做光怪陆离）。我希望，性社会学能够很快地成为人们的新的判定标准之一。

性学，还是性社会学？

——研究方法的区别

□ / 潘绥铭

性学还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适用的、独特的方法论。它那以上千本巨著堆砌起来的学科殿堂，还缺乏一个使之具有生命力的灵魂。结果，在美国每年生产出的 10 万名以上的博士当中，性学家只有区区数人。

1929 年以前，研究性现象的主要是心理学家，因此当时性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对临床病例的分析与归纳。随后，性学开始兵分三路。

第一路是“实验室学派”主张运用在实验室中进行观察与检测的方法。1966 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一书出版。他们观察和测量了 382 位女性和 312 位男性的数千次性反应。1978 年，法卡斯等三位学者创立了男性观看性电影时的反应的常规模式。1983 年，另外三位学者又论证了上述常模也适用于女性。时至今日，这一学派的研究已经纵向深入到 PC 肌、脑电波、激素分泌水平等层次上，横向扩展到恋爱中的性反应了。

第二路是“社会调查学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学者就调查了上千人的性行为。但是这个学派被公认的创立，则是金西于 1948 年出版的《人类男性性行为》和 1953 年出版的《人类女性性行为》，俗称“金西报告”。1972 年，盖格农提出了“性脚本”理论，被认为是“性社会学”的创始之作。到 1994 年 10 月，劳曼和盖格农等 4 人运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第一次完成了对总人口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出版了《美国人的性生活》（普及本）和《性的社会组织》（学术本）。

第三路是“心理—行为学派”。它的鼻祖是弗洛伊德，而且有德门特、马斯洛、罗洛·梅等后继者。现在的学者更加强调把性心理现象与性行为实践统一

起来研究。他们的主要建树，一是创立了数十种性心理的量表，可以测定许许多多的性心理障碍和性心理发育水平；二是1979年卡普兰发表的《新的性治疗学》和1989年罗比科罗创立的性的系统疗法。目前，遍布北美的成千个“性诊所”，大多数都是运用这一学派的理论与技术。

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对经典性学提出了挑战。它把性学的这三路兵马一股脑都看作是“科学教”，是迷信“价值中立”的荒谬产物。他们以相对主义为思想武器，反客观，反统计，反规律，更反对所谓“性教育”与“性治疗”。

但是，它们之所以还难以撼动经典性学，问题并不是出在结论上，而是由于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流派目前都还仅仅处于批判传统的阶段，离建设还很远，因此它们在性研究方面还提不出任何一种可操作的新方法。

这就构成了一种总体上的危机。不仅是经典性学的危机，也是性学发展上的危机。

各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它们各自的研究的基本单位不同。

实验室学派按照生物学的规定，强调物种的同一性，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人类，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因此在总结人类的性行为时，就象做药物试验一样，并不需要随机抽样，只要具有相当数量的样本就足够了。社会调查学派则把群体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强调人的社会特征，也就是人的群体所属。因此它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必须保证所研究的样本具有总体代表性。心理—行为学派却把个体作为自己学科研究的基本单位，强调个性和个性差异。因此个案研究是它的家珍。

这样一来，如果想把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三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却根本就无法确定，我们的基本研究单位究竟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呢？

各学科的验证手段也在互相冲突。

实验室学派只相信在可控条件下的客观观测结果。社会调查学派的一切数据都是当事人主诉的情况。心理—行为学派力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是恰恰因此而造成两边不讨好。

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吗？——随机抽取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的3000人；把实验设备搬到每个人的家里，实地观测他们的真实性行为；同时（性生活的同时！）对他们进行心理测量与行为分析；最后还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主观认知与评价。

即使我们终有一天能够这样做，也仍然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各学科检测所获得的数据，根本就无法换算，无法合成。

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为例：他们在进行生理测试的同时，也询问了被试者的心理状况，分析了被试者的社会特征。但是，如果某个女性被试者，在性高潮期间的血液收缩压为 55 毫米汞柱；心理上出现“中等强度”的性高潮体验；性态度是觉得“很平常”；社会特征是 28 岁，大学毕业；那么，汞柱数值与年龄或者文化程度能够进行数值比较或者数量运算吗？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能够得出一个综合的数据吗？即使能，它究竟能够说明些什么呢？

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个学科的进展都依赖于方法论的突破，然后是发明相应的操作手段。

但是传统的三大学科的研究，目前已经接近极致，已经不大可能再出现本质上的突破，只能在现有水平上更加广泛地运用既有成果而已。

中国性学离综合研究还很远，还不具备在方法论上实现突破的能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最需要的恐怕还是首先把各自学科里现有的方法运用好；需要在难得的少数交流与研讨的机会中，更多地关注各种研究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它们的结论。

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许多学者的定性分析能力是相当强的，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认识，在原则上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是相通的。如果说，人类可以跨越过量化研究的历史阶段，直接奔向未来的新方法论，那么中国性学家们说不定也可能因祸得福。

发展“性”研究的“主体构建”思想^①

□/黄盈盈^② 潘绥铭

“性”(Sexuality),虽然起源很早,但是在英语国家中,是在1960年代以后才逐渐普及开来的,它现在已经成为几乎一切非医学的性研究的根基与中心,强调附着于“性”上面的文化和社会的因素,为的是区别于作为科学的、医学的sex统治话语。Sexuality和sex目前都被翻译成性,而“性”这个字则是20世纪初从日本引入的,而且带有很强的医学化和科学化色彩。而我们要提倡的恰恰是中国的性学研究应该从sex过渡到sexuality。

综述相关的文献,“性”研究可以被概括为两大类:性的实证主义派和性的建构主义派。但是,即使是两大派的内部,也存在很多的差异性,而我们在这里则更加详细、具体地概括和提出“性”研究领域的“主体构建”思想。这种思想来源于学界对于“性”的各种讨论以及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流派。

“性”研究最大众化的争论是关于它的外延。

由于sexuality来源于sex,又与gender这个新词汇几乎是同时被普及的,所以一般大众认为这三个词汇有密切的联系,又不大懂得其中的相互关系。结果在研究中也出现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把sexuality更多地与sex联系起来,主张sexuality是sex的扩大与深化。在这种理论倾向中,“性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色彩更加常见,而且不仅在传统上是建构人们的sexuality的主要力量,也是20世纪中“性行为研究”的根基。我们姑且把这种理论倾向叫做“性学派”。

另外一种倾向则是更多地把sexuality与gender联系起来,例如一些女性主

① 本文改编自黄盈盈的博士论文《身体、性及其关系的主体构建》(2005年)的一个小节;其中的部分内容和观点将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义理论就认为 gender 包容着 sexuality。更常见的是在 sexuality 的题目之下，讨论的其实却是 gender 的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性别派”。

在目前的大多数性研究者看来，更重要的、更加具有学术意义的，是对于它的内涵的争论。

虽然大家都在研究 sexuality，但是有许多研究者是把 sexuality 当作一个无须证明、无须解释的“公理”般的概念来使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说。这种情况在政治相关的与性别相关的研究当中，在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当中最为常见，姑且叫做“公理派”。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仍然沿用传统的“客观测定”的视角、思路与方法，试图给 sexuality 一个明晰的、固定的、普适的“定义”。目前为止所见的对于 sexuality 的定量研究（问卷调查），基本上都属于这一学派，姑且称为“测定派”。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信奉后现代思潮的学者研究 sexuality 则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们致力于在具体的情境（context）里面来确定 sexuality 的含义，尤其是，从主体感受与主体解释方面来研究 sexuality 的主体意义。可惜，这样的学者目前还不多。

我们将明确提出和发展“性”研究的“主体构建”视角，并把它的理论基础概括为下列的逻辑线索：

● “性”（sexuality）是弥散式的。

它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女之事”、“床上之事”、“生殖相关之事”；更是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爱情与亲密之事、情感表达之事、人伦与交往之事、生存体验与生命价值之事。它当然包括同性恋等各种处于少数地位的性现象，还包括种种“涉性现象”，例如谈“性”、听“性”、感受“性”与“性感”的日常实践等等。因此，给它的外延确定某种边界，其实只是学术研究之不得已，而不是生活实践本身。

● “性”（sexuality）是主体感受的。

无论生物学给出什么样的定义，弥散式的 sexuality 只能存在于主体对它的具体感受之中，或者说，只有确实被某个人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才足以构成他（她）的 sexuality。

● “性”（sexuality）是被主体所标定的。

它不仅仅是一种“可测定的客观存在”（例如人们通常所关心的“性行为”与“性关系”）；更是一种“主体”（人们自己）依据自己的感受、认知、与自我反馈，对于“性”（sex）所做出的种种标定、解释与评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种种“日常生活实践”，例如、选择、策略、路径等等。

● “性” (sexuality) 是意义化的。

它虽然会带来种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结果，但是对于人与生活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对于主体以及各种相关物产生各式各样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是说，一个人不仅要标定什么是 sexuality，而且必须赋予它某些价值与意义，才能够成为他（她）自己的确实存在的 sexuality。

● “性” (sexuality) 的意义来源于主体与“情境” (context) 的互构。

Sexuality 的意义既不来源于“天生的自然本能”，也不是“历史决定”或者“环境决定”的被动产物。它是主体能动性与这些“外在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主体构建”即强调个体的体验，又把个体的体验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是一种宏观微观的交融物。“情境” (context) 涉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氛围，涉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也涉及活动于这些氛围和时空中的若干主体；“情境”可大可小，可宏观可微观，但是需要是具体的，在本研究中偏向是可感知的、被体验的。

● “性” (sexuality) 的建构是一个持续可变的过程。

● “性” (sexuality) 的变化更多地来源于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是单纯的认知或者外力作用。

● “性” (sexuality) 与社会性别 (gender)、身体 (body) 等等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应该、也是可以被区分的。

综上所述，我们姑且把这些思想称为“主体建构派”。

它一方面与“性学派”、“社会性别派”争论着 sexuality 的独立性与可识别性；另一方面又与“公理派”、“测定派”争论着 sexuality 的研究方法论。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主体建构派”来源于而且丰富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传统学术流派之间的论战。它可以说属于社会构建理论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强调社会、文化、政治因素的同时，更加突出“主体”的位置和能动性，以及“个体体验”性；突出两者的融合和超越。

这些逻辑在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中（尤其是人类学中）并不新鲜，但是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具体到“性”研究领域里，更是少见，再具体到中国的“性”研究，则少之又少。

此外，sexuality 这个领域和题目，可以作为一个更典型的、更深刻的例子，来映射与揭示其他研究领域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而且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有利于研究者传播自己的主张；所以才有一些其实根本不打算专门研究 sexuality

的社会思想家也参加进来，写出唐皇巨著，例如马尔库塞、佛洛姆、福柯与吉登斯。

但是，中国的大部分性研究目前仍然处于“时事报导和评论”的初级阶段，就连“拿来主义”也不是。在中国，对于“主体建构论”的介绍与引进还很少，主要散见于其他研究领域，性研究中基本是空白。我们在摸索了20年之后，才在最近几年来逐步定位于这个学派，并且力图在中国发展之。

从这个背景与发展脉络来看，我们最近所做的论文，无疑是属于“主体建构论”在中国当代“情境”之中所做出的具体成果，坚定地贯彻了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视角与方法。在多年前的论文《性研究的方法论冲突》中就提出过，中国研究者如果想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学派的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三大方向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性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学术积累与研究条件都远远不够；更是因为这三大传统学科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无法化解的矛盾。

与此相反，属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性研究中的“主体建构论”，很可能是我们这些“后发”研究者最容易成功的突破口；尤其是最容易做出我们中国人的原创的、本土的学术贡献。

当然，这绝不是一个“捷径”，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学术批评，恰恰是建立在精通并且深刻理解各种传统学派的基础之上。通俗地说，只有专家，才有可能批评自己的专业；否则就成了“无知者无畏”了。正是因此，我们才仍然不懈地进行着一些属于经典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只不过是力图在方法论的高度上，争取“破茧而出”。